

新中国新闻文体70年：“范式”的共生与交融

刘 勇

〔摘 要〕 新闻文体是新闻报道的结构方式与话语体式,其嬗变背后包孕着记者新闻实践的逻辑以及整个新闻业的观念变迁。新闻文体范式是不同性质新闻文体规范的提炼与表征,着眼于“怎么写”,强调跳脱具体的新闻文本,观照文体形态以及技巧背后的文体观念。结合新闻文体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外形态,1949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发展史依循新闻与政治、文学(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契合新闻文体内生逻辑的自洽性,其实质是“宣传范式”、“文学范式”与“专业范式”三种文体范式相互勾连、交织与融通,彼此借鉴、吸纳与改造的过程。三大范式并非完全按照时间线索渐次出现,也不是简单迭代关系,相反,它们有时会共生于同一阶段,有时会共存在于一家媒体之中,有时甚至会出现同一篇新闻文本之中。

〔关键词〕 新闻文体;宣传范式;文学范式;专业范式

作为新闻的结构方式与话语体式,当代新闻文体的变迁彰显了70年来我国新闻观念的演进轨迹,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理解当代新闻观念嬗变的另一种思路:“深入到新闻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物质生产与交往的需要中去,从那里去寻找新闻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去发现新闻观念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广泛联系;深入到新闻业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规律中去,从那里去认清新闻观念演进的历程与方位。”^①

一、“范式”:打量新闻文体史的另一种视角

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报道文本千差万别,新闻文体从样式到观念也多姿多彩。用报道方式、报道模式、报道形式,抑或直接用消息、通讯、特稿、非虚构写作等不同名称来指称,似乎都有一定的描述力和解释力,但又都还不足以概括新闻文体演进的内在逻辑。为此,我们“挪借”科学哲学的关键概念——“范式”(Paradigm),基于范式的变迁与互动来观测当代中国新闻文体的嬗变。

“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创造”,用以解释科学发展的机制。他指出,所谓范

刘勇,新闻学博士,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合肥230601)。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史研究(1949—2012)”(13CXW005)研究成果。

①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亦即“公认的模型或模式 (Pattern)”。^①库恩尽管对“范式”进行了学理界定,但他自己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又是多义的,甚至模糊的,英国哲学家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就发现《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概念的含义多达21种。^②由此,这个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学术张力遂引发了学术界持续而广泛的讨论。此后,为了回应各方面的批评与追问,库恩又连续发表论文加以解释。1969年,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再版“后记”中,明确了“范式”的两种意义:一方面,范式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代表这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作为示范型的以往成就”,范式“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③一言以蔽之,“范式”应该是一个整体,它囊括了形而上的信仰、实际操作规范以及实践中的成功范例。同时,“范式”也为科学研究中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

尽管库恩仅将范式理论运用于科学哲学领域,且明确将人文社会科学排除在外,但吊诡的是,“范式”概念却在不同学科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中“旅行”,并且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与价值,诚如佩里(PERRY)所言:“如果说库恩的工作是在全力以赴地界定其核心术语的含义,那么其他人的工作便是不遗余力地扩充它们的含义”。^④

陶东风教授是较早将“范式”概念引入文体学领域的学者。他在专著《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一书中赋予“文体范式”基本内涵:“每一种特定的文类都有其范式,即支配性的文体规范,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是一种感受、体验结构,又是一种语言组织结构,即文体结构。”^⑤由此可见,“文体范式”具有超越其他文体要素的内涵,它实质包含了文体规范、文体结构和作家的认知与风格等多个维度。文体学的这种尝试也为新闻文体领域引入“范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大陆新闻界最早引入“范式”概念的是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主编李大同。1985年,他在《漫谈名记者》一文中指出,具有相同心理素质和素养水平的记者,之所以在成就上也出现很大的差别,“取决于他们选择新闻素材和制作新闻成品时所采用的‘范式’不同。”在他看来,“‘范式’这个概念,内涵极其丰富,由于库恩表述上的缺陷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争议”。随后,他将“范式”与记者的新闻生产过程相勾连:“一个记者在新闻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都遵循着一定的范式。新闻价值的判断、素材的选择、新闻的形式、突出的重点等等,无一不取决于记者的范式。”^⑥这里,李大同提及的“记者的范式”其实是记者新闻观念与文体技巧的总和,亦即“新闻范式”(Journalistic Paradigm)——“指导新闻媒体确认并诠释值得报道的‘社会事实’的认知模式或格式塔型世界观,具有统领新闻实践的各规范性原则和从业知识,并将之整合成内部同一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功能。”^⑦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范式”是我们审视记者以及媒体新闻实践的一个重要“窗口”。

本文用“范式”来表征不同特质的新闻文体规范,也是希图从另一个向度来审视当代中国新闻文体的变迁。从深层次看,“新闻文体范式”归因于“新闻范式”,但二者又存在不同之处,后者范畴更广,前者既不是新闻报道的形式,也不完全等同于新闻报道的模式,它更多以“新闻文体范型”为变量,着眼于“怎么写”,规定了新闻文本的基本框架、结构方式以及话语体式等,指涉的是文体形态、报

①[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②陈丽杰:《模糊的“范式”——再论库恩的“范式”》,《理论界》2017年第7期。

③[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7页。

④崔伟奇、史阿娜:《论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运用的张力》,《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

⑤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页。

⑥李大同:《漫谈名记者》见张建伟:《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下),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51—52页。

⑦潘忠党、陈韬文:《从媒体范例评价看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变》,《新闻学研究》(台湾)2004年第78期。

道技巧背后的文体理念。

引入“范式”概念,为我们打量新闻文体的演变与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媒体、不同记者生产的新闻文本恒河沙数,种类、形态也千变万化、不胜枚举。“新闻文体范式”则是对单纯新闻文本的提炼与超越,从而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1949年以来我国新闻文体演进的脉络与文体观念的移位。另一方面,“新闻文体范式”能够为我们寻找不同文体样态创变与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路。文体范式的变换与迁移,依循新闻与政治、文学(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契合新闻文体内生逻辑的自洽性。基于此,我们尝试经由“新闻文体范式”这一概念,对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70年历史展开“深描”。

二、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三大范式

新闻文本中所透露出的整体性特征、内在机理、规范性要求以及成功的文体范例等,结合不同报纸的性质与风格定位、中国新闻文体的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构成了我们判断范式类型的一个重要标准。循此标准,我们将1949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划分为三大范式:宣传范式、文学范式和专业范式。

“宣传范式”指的是新闻文体的逻辑起点与功能指向都以宣传为根本目的,其实质是运用新闻进行宣传,强调新闻承载的是意识形态功能,体现的是政治力量对于新闻的征用。“任何新闻宣传都是为一定的党派和社会团体服务的,都是他们经济政治利益的集中反映。”^①在我国,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阐释了“五个事关”的重要表述——“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②有鉴于此,“新闻文体宣传范式”不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各级党报党刊之中,而且도存在于专业报、晚报、都市报等不同类型的报纸之中。换言之,宣传范式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新闻文体的主导范式,政治宣传的观念与根本诉求对新闻文体的观念与话语方式都产生着巨大影响。人民日报老报人李庄就曾总结他参加40年代太行山根据地整风运动之后所形构的“渗透到血液里”的“宣传范式”：“第一,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听党的话,无条件根据党的决定办事;第二,新闻必须真实,不能有半点虚假。终生实践这两条,可以安身立命了。”^③

“文学范式”显示的是文学之于新闻文体的影响。舒德森就曾断言:“新闻不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组文学形式。一些新闻的形式像悬疑小说、传奇或五行打油诗那样可预测和公式化,其他新闻形式则更加复杂,无论是新闻从业者还是读者都不能完全意识到其审美规范。”^④历时地看,近代中国新闻文体源自古典文学。据考证,我国近代消息是从记叙文转化而来,大体包括三种形式:平铺直叙式(这类消息写法从《左传》及大多数笔记小品中移植过来)、叙中加议式(这是直接搬用《史记》《聊斋志异》和一些笔记文的手法)、编年史式(这种写法似史书中的编年史)。而早期的通讯也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记、游记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其中,纪实性通讯(脱胎于《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传记)、旅游考察通讯(取法于杨銮之的《洛阳伽蓝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游记)、人物传记(几乎和史书上的人物传记一模一样)。^⑤

可见,近代新闻文体正是在古典文学的不断滋养中得以产生与独立。楼榕娇在《新闻文学概论》

①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第310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1—332页。

③李庄:《李庄文集·回忆录编(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447页。

④[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陈昌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⑤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7页。

中,就直接将各种新闻文体命名为“新闻文学”——“普通文学着重于情感的流露,故事的夸大,感人的深远,所以或有虚构的内容,而新闻文学则重在事实的报道,站在抢先的时机上,而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这种新闻体裁随着新闻事业的扩展,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生活,渐渐独立起来,成为新兴的新闻文学。”^①楼氏的“新闻文学”虽然过于泛化,但新闻文体包孕着文学的诸多要素却是不争的事实,从确立主题的方式方法到文章起承转合的结构布局,从记叙、议论、抒情等不同的表达方式到文章的遣词造句,新闻文体的生成都与文学密切相关。艾丰指出,在各种借鉴中,新闻作品向文学作品的借鉴是最多的,这是因为:“文学是最古老因而也是最丰富的宝库;新闻作品,特别是报纸上的新闻作品,最基础的要素还是文字。因此借鉴起来就更直接、更容易些。”^②本文“新闻文体文学范式”,即是指新闻报道中调用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来呈现新闻的方式,它表现在文体样态上,是指散文式新闻、新闻特写、报告文学等杂交文体的出现,表现在方法上则是散文、小说等写作技法在新闻中的借鉴与改造。

“专业范式”呈现的是新闻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所具备的本质特征和独特气质。专业范式视域中的新闻,强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满足人们对于预知而未知的信息的需要。塔奇曼在《做新闻》中开宗明义,标识了新闻的内涵——“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它替代了旧时走街串巷向公众通告消息的人,其功能是告诉我们想知道、需要知道以及应该知道的消息”。^③因此,“新闻文体专业范式”源自新闻职业化进程中逐渐型构的专业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操作原则。20世纪80年代开始,深度报道的诞生使专业范式得以萌发并不断传承。90年代后,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引入,《南方周末》、《财经》杂志、央视《新闻调查》等一批专业媒体的专业实践,新闻专业理念、专业伦理与专业规范逐渐成为中国记者的价值共识和身份认同的标志。新世纪以来,伴随调查性报道的“黄金十年”(2003—2013)的出现,加之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介的崛起,UGC(用户生产内容)的兴起,专业范式又呈现出新的变化。“新世纪迄今,则在社会控制复杂、利益诉求分化的现实中,启蒙式微、监督受挫,伴随对事实原则的捍卫、对专业精神的传播、对揭示真相的诉求,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价值取向正在实践中变得分化与多元。”^④

以上,我们对三大范式进行了初步的阐释,但这种“抓大放小”的划分方式似难逃“化约主义”的魔咒。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现实(尤其是历史事实)并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类设定的标准而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样貌。就像科学实验中的条件限定一样,分类只是为了研究便利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简化方式。倘若我们能够据此大体厘清新闻文体的嬗变轨迹与实存状态,则也不失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方式。

此外,通过系统的阅读大量的新闻文本以及对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我们认为,三大范式并非完全按照时间线索渐次出现,也不是简单迭代关系,相反,它们有时会共生于同一阶段,有时会共存在于一家媒体之中,有时甚至会出现同一篇新闻文本中。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维度看,三大范式之间的互动常常表现为相互勾连、交织与融通,彼此借鉴、吸纳与改造。对此,三位学者的研究也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佐证。李良荣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新闻专业主义’可以在‘政治家办报’和‘商人办报’之间起到很好的调节和制衡作用,它可以外化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内化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知。”^⑤杨保军教授从现实出发做出判断:“在新闻与宣传两种主要功能的实践中进行传播,是当代中国新闻业的突出特征之一。”^⑥单波教授则基于对新闻文体历史的考察指出,“对多数中国记者而言,感时忧国、文以载道的精神传统突现了政治观念对新闻文体的影响,使新闻文体结构偏向于新

①楼榕娇:《新闻文学概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2—3页。

②艾丰:《新闻写作方法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94页。

③[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④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⑤王长庚:《媒介整合的背景及应对举措——李良荣教授在暨南大学大专题演讲述评》,《当代传播》2002年第3期。

⑥杨保军:《三个向度中的当代中国新闻业》,《今传媒》2008年第6期。

闻的教化功能,诗学、戏剧化传统使新闻叙事结构侧重于抒情性细节,强调写现场情景和任务思想感情的细节,以达到以情动人。”^①

三、当代中国新闻文体演进:三大范式的共生与交融

范式是新闻文体演变的重要表征。依据新闻文体的特质、新闻媒体的特点以及新闻生态环境的特征,结合不同文体范式的生成与变化历程,我们将1949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分成五个阶段。

(一) 1949—1965:从三大范式并存到“宣传范式”主导地位的确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生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完成了中国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之相对应,新闻文体历经多次变化,从开始的多范式并存逐步转向“宣传范式”为主导。

建国之初,党的新闻队伍开始从解放区进入各大城市,多年形成的办报方式难以适应城市办报的要求。加之,新闻人才奇缺。1949年6月,中共中央在回复华中局的一份电报中,开门见山:“新闻干部现在全国各地均感不敷”,为此,中央建议:“对于各城市原有报纸中的进步分子及有能力经验而力求进步的分子应放手利用……对随军南下及各城市招收的纯洁的有编写能力的知识青年,亦应同样任用。”^②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宣传范式”难以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主导地位。于是,向文学求援,借鉴旧中国的新闻写法,就成了当时一种立竿见影的“权宜之计”。例如,对于开国大典的报道,就集中体现了建国之初“宣传范式”型构中对于“文学范式”的借鉴与融合。名记者杨刚在《大公报》发表的《给上海人的一封信——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篇通讯运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借鉴散文笔法,融合记者观察与现场采访、客观呈现与主观评论,大量调用比喻、反复、排比、对仗、通感等文学修辞手法,借助描写、议论与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记者的观察之仔细,描写之细致,语言表达之优美,都已经超出了一般新闻报道的范畴,如果没有标明是“新闻通讯”,恐怕绝大多数读者会将这篇通讯直接视为一篇充满美感的散文。总体看,建国之初新闻文体的整体特点是:题材集中于成就报道,体裁上以通讯、特写为主,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较少,写作上偏向文学化表达,包裹着记者的真挚感情,体现“宣传范式”对于“文学范式”的借鉴与吸纳。但是与此同时,新中国记者们“不写新闻”“不会写新闻”“新闻写作不规范”“宣传缺乏技巧”等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

1950年12月,吴冷西在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许多综合报道还有现象罗列、缺乏分析、包罗万象、缺乏中心、不解决问题、议论过多等现象,这是必须改进的。”^③及至1954年2月,新华社党组向中央呈递的《关于新华社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的报告》中,依然将“新闻写作水平不高”作为报道质量不高的主要表现——“新闻议论很多,不善于‘用事实说话’,内容庞杂,逻辑不清,不合新闻规格,没有背景,文字枯燥乏味,有不少陈词滥调、僻词僻字。所有这些缺点,都使新闻的作用大受减弱,不能更好地吸引读者和教育读者。”^④同年,邓拓在《怎样改进报纸工作》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报纸的新闻必须改革”。因为“现在我们报纸的新闻,都是长篇大论,不是新闻,而且千篇一

^①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第7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解决新闻干部缺乏问题复华中局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83页。

^③《吴冷西同志在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上的报告——把新华社的报道工作提高一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25—126页。

^④《新华社党组关于新华社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的报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第364—365页。

律,枯燥乏味。”^①这些事实显示建国初期新闻文体“宣传范式”尚处于规范建构与培育阶段。为此,新华社专门开展了“练笔运动”,训练记者的专业技能。人民日报则专门邀请叶圣陶为编辑记者进行写作培训,强调写作的基本规范。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致读者》,拉开第二次新闻改革的大幕,实质是力图在“宣传范式”框架内,实现新闻写作的专业化,标志着新闻文体“宣传范式”基本奠定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主导地位。这不仅包含宣传范式的特征与功能,也包括了其主要问题。“从新闻文体内形式来看,战争年代和党派斗争时期形成的以观念统摄事实,用事实印证主题单一思维向度,不仅没有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有所变化,相反仍片面将新闻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由于事实为政治服务、主题先行等主观唯心主义观念的盛行,特别是十年文革,记者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格式被套上重重枷锁,记者在新闻写作中的主体性被扼杀,许多接着已不自觉地成为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反映在记者对事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格式上,形成了以单一、静止、片面为基本特征的形而上学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②

新闻文体“文学范式”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一方面,“宣传范式”直接吸纳和借鉴文学创作的理念与方法,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互动。例如,为了宣传抗美援朝,一大批作家获准进入朝鲜,写出了大量诸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可歌可泣的报告文学作品,开创了新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一个发展高峰,促成了新闻文体“文学范式”的形构。与此同时,关于新闻与文学关系的讨论也切实深化了新闻界对于新闻文体“文学范式”的认识。1953年关于《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的讨论,最终确立了新闻与文学关系的基本原则——“文学不能代替新闻,这是有关新闻生命的原则问题。”^③另一方面,当“宣传范式”成为一种主导范式时,新闻写作的模式化、八股化倾向日益严重。为了提升宣传效果,增强新闻的可读性,“散文”成为新闻界直接调用的文体样式,杂交文体“散文式新闻”遂成为“宣传范式”框架下新闻文体的一种“调适性文体”。1963年,穆青发表《尝试用散文笔法写新闻》,号召新闻界借鉴散文的笔法、结构与语言来改变新闻文体僵化、死板的状况。“散文的写法是否是一条出路?现在还在试验,能不能成功还很难说,但不妨试试看。”^④这不仅显示“散文式新闻”在当时已渐成一种新闻写作领域的“风气”,也表明新闻文体“文学范式”主要体现为新闻写作对于文学样式、理念与技巧的融合与借鉴。

这一时期,新闻文体的“专业范式”也初露端倪。这首先与党和国家为了提升对外宣传效果有关。1952年5月18日,周恩来总理致信李克农和乔冠华,要求他们“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意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国内方面亦将采用同样方针,并告。”^⑤这表明,周恩来已经注意到其时的新闻宣传主观色彩太多浓厚、意图太过明显,写作过于生硬、缺乏技巧等与新闻客观性相背离的问题。同年,成立于1938年的“国际新闻社”更名为“中国新闻社”。此后,“中新社”的新闻实践开始对接专业新闻的国际标准,努力“保持理性、冷静的心态,秉持真实、客观的职业操守”,逐渐形成了“中新体”风格——“实”,即用事实说话,以平实的态度说话,力戒官话、套话、空话和“应当懂得”之类的教训话;“宽”,指报道领域的宽泛;“短”,即短小精悍,开门见山,力戒废话;“快”,指报道及时,以“敢为天下先”的拼抢精神提高新闻的时效;

①邓拓:《如何改进报纸工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31页。

②樊凡:《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4—245页。

③华山:《文学不能代替新闻——〈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篇讨论的结论》,见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3页。

④穆青:《尝试用散文笔法写新闻》,见穆青:《穆青论新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81—82页。

⑤《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关于新闻稿件的指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第223页。

“活”，即行文活泼，角度新颖，注重细节。^①尽管“中新体”也是基于对外宣传的根本目的，其“专业范式”虽未形成，但已开始尝试与西方新闻文体对接，选择了一条与“新华体”完全不同的路径。当然，这一时期“专业范式”理念还与刘少奇的指示有关。

1956年5月28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对新华社的第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新闻的报道，学塔斯社的新闻格式，死板得很，毫不活泼……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的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②这表明，刘少奇已经看到新闻宣传一味模仿苏联的问题。他提出的“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方针，实质是对“专业范式”的一种高度概括，因为只有首先学会西方新闻的话语体式，新华社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这一时期，伴随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由此一元化的党报体制也随之逐步建立，反映在新闻文体维度，即是“宣传范式”逐步成为中国各大报纸的示范，影响并规约着新闻界的文体实践，此后不同党报从形态到技法也呈现出同质化态势——“党报模式作为我国新闻传播工作的一个‘标准’参照系，确实对各类报纸传播行为的控制方面，起着相当大的规范化作用”。^③

（二）1966—1976：“宣传范式”的畸变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专业范式”与“文学范式”几乎完全绝迹，党的新闻宣传的基本原则与正确方针被大规模破坏，“宣传范式”出现诸多变异，新闻界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一时期新闻文体显示出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语录体新闻”盛行。所谓“语录体新闻”是指摘引毛泽东等革命导师话语的新闻报道形式。这股风气肇始于1960年11月。其时，《红旗》杂志对革命领袖引文，首次用黑体、仿宋体等与正文相区别的字体排出，此后各报纷纷仿效，很快成为一种席卷整个新闻界的潮流。1961年5月1日开始，《解放军报》摘登毛泽东语录，成为各报大量刊登领袖语录的发端。^④据统计，从1961年5月1日到1964年2月12日，《解放军报》共刊登毛主席语录达264条。^⑤

除了新闻中出现“语录”，在一批报纸的带动下，“毛主席语录及毛主席著作文句上报眼”也成为一种通行的做法。1961年1月6日，《中国青年报》率先在该报头版报头右报眼（以前刊登要闻的位置）围以方框，不定期刊登毛主席著作文句摘录。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开始在报眼刊登“语录”，此后各省委、直辖市的机关党报纷纷效仿。至此，报刊每天必须登“语录”，报刊所登载的文章篇篇引用“语录”，可谓“无语录不成报”、“无语录不成文”。^⑥

“语录体新闻”这种不问具体时空、无视新闻事实而寻章摘句的形式主义做法，从根本破坏了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文体“宣传范式”也迅速走向庸俗化和教条化。

第二，新闻界弥漫着“假大空”的新闻文风。“文革”时的新闻文风被冠以“假大空”，即假话、大话、空话。童兵教授在《主体与喉舌》中曾将其时的新闻导语总结为一种特定的“模式”：

（单位）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抓革命，促

①刘北宪：《中国新闻社六十年佳作·消息篇》，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004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358—382页。

③喻国明：《中国新闻业透视——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41页。

④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1页。

⑤解放军报社党委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为提高〈解放军报〉的现实理论性而奋斗》，《新闻业务》1964年第5期。

⑥刘家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5—287页。

生产(或促科研、促教育、促……)。^①

1976年7月29日,新华社对“唐山大地震”的报道就显示了这种文风。作为新华社在震后的第一篇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主标题即显示出当时新闻写作的共性特征:以“救灾”取代“灾情”。导语交代了地震的基本情况,但对于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主要损失却一笔带过——“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主体部分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人民群众十分关怀”起笔,后面串接了官员、部门赶赴灾区救灾的“表述”,结尾“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展开抗灾斗争。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这种“口号式”的结尾是当时“宣传范式”的基本笔法。但是,伤亡人数、直接损失等重要信息在新闻中却隐匿不见。

(三) 1977—1989:“范式”的调整与复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历史新时期。基于此,新闻界从新闻文体的篇幅、语言表达、新闻文风入手进行改革,由此新闻文体的三大范式也进入了调整与复兴阶段。

1. “宣传范式”的调整

“文革”十年造成“宣传范式”的畸变,新闻写作中充斥着诸如“党八股”、“帮八股”等各种问题。有鉴于此,新闻界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并产生了显著变化,开始“从一般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转到“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反映公众舆论、传播信息和知识,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②

一方面,摆脱“新闻腔”,重申新闻文体的基本特征。1977年,新闻文体“宣传范式”的问题被统称为“新闻腔”,亦即“细节缺失、事例条陈、语言呆板;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行话成篇;抽象而不具体,笼统而不明确;生搬硬套,以‘通用语言’制造‘批量产品’;概述而不描写,无细节,无现场感;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没有独特的个性;灌输式、命令式、训话式的语言泛滥。”^③1981年11月11日,在庆祝新华社建社50周年的茶话会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对改进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著名的五点希望:一是“真”,新闻必须真实;二是“短”,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三是“快”,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四是“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五是“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④“五字方针”从题材、形式、写法等维度,建构了“宣传范式”视域中新闻文体的基本特征,成为新时期新闻文体改革的重要指针。

另一方面,借鉴“专业范式”,恢复报纸的“信息功能”。“传播信息”是新闻文体“专业范式”的基本功能。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彩色故事片——〈熊迹〉〈青春〉》,1月4日,刊登中国话剧团演出话剧《转折》的消息,被视为“报纸逐渐恢复其信息功能的一个开端”。^⑤此后,新闻界开始倡导运用“短新闻”来提升信息量。1979年4月23日,《新华日报》创办“今日快讯”,每天发表短、快、新、活的消息少则四五条,多则十几条,到1984年共发表12000多条。^⑥1980年11月,《解放军报》开设“一句话新闻”专栏,到1982年底已经见报600多条。“一句话新闻”在句子结构形式上,采用主谓结构;

^①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第149页。

^②钟沛璋:《中国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展望——为建国三十五周年而作》,见《中国新闻年鉴1985》,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2页。

^③童兵、陈绚:《新闻传播学大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④习仲勋:《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对新华社宣传报道提出五点希望》,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开创新闻工作的新局面》,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43页。

^⑤张建星:《中国报业40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4页。

^⑥新华日报编辑部:《坚持办好“今日快讯”》,见《中国新闻年鉴198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83页。

写法上要去一事一报,文字精炼,追求“新、短、多、广”的效果。1984年3月,该报又创办“鸡毛信”专栏,大量刊登快讯、短新闻,所登稿件最长六七百字,短的只有一二百字,其主旨是为了“恢复新闻应有的新、短、快、实的特点,使真正的新闻占领版面”。^①

2. “文学范式”的复兴

新时期新闻文体“文学范式”的复兴肇始于报告文学,“改革的年代,与新闻媒介争夺读者的最强有力的对手是报告文学。”^②徐迟的《地质之光》(1977)、《歌德巴赫猜想》(1978)、刘宾雁的《人妖之间》(1979)开启了80年代报告文学勃兴的大幕。此后,以《唐山大地震》《西部在移民》《神圣忧思录》《世界大串联》《胡杨泪》为代表的“全景式报告文学”、“问题式报告文学”等作品横空出世,掀起了当代报告文学的第二次高潮。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共刊发160多篇报告文学,平均每个月至少刊发一篇,有时甚至每周一篇。^③与50年代报告文学集中讴歌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同,80年代的报告文学的题材开始偏向对现实问题的揭露,“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新闻报道刚刚开始活跃便被套上枷锁时,一些呼唤人性、披露史实、触及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却日益受到读者钟爱。”^④

作为一种杂交文体,如果说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文体边界处于某种“模糊地带”。那么,属于新闻范畴的“大特写”则直接型构了新闻文体的“文学范式”。1985年,上海《生活周刊》正式开创出这种新的文体样式,亦即“抓住社会热点中的事件、人物或现象,对新闻事实作全方位、多侧面的报道,用优美的文笔、新颖的题饰、突出的照片吸引读者的一种报道形式……它处在新闻的前沿,在向文学靠拢,但归根结底还是属于新闻范畴。”^⑤

新闻文体“文学范式”核心追求与“可读性”有关。这个概念由老报人赵超构在1981年明确提出。他认为,所谓“加强可读性”,是指新闻报道首先要“能让绝大多数一般水平的读者读得下去”。为此,他列出了增强可读性的四种方法:第一,要“浅出”,即“通俗化”“常识化”;第二,必须“刹长风,去呆板,去单调,去沉闷”;第三,做到“广些再广些”,即题材广泛;第四,去除“套话”,改进文风。^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文体“文学范式”的逻辑原点就是基于“可读性”的这一根本诉求。在此逻辑的牵引下,“散文式新闻”因时而生。1982年1月,穆青再次提出新闻要“向散文式方向”发展的观点。同年7月,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发表消息《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该文以精巧的结构、优美的文字突破了“追悼会新闻”的固定模式,掀起了新时期运用散文笔法追求新闻可读性的一股热潮,也建构了新闻文体“文学范式”的重要特征。

纵观整个1980年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进一步加强了与文学、史学的‘血缘关系’,如用文学方法表现事件和人物的报告文学,借鉴散文笔法写报道的散文式新闻,与历史背景融合在一起的传奇式报道等。”^⑦由此,新闻文体的“文学范式”得以复兴并不断型构。

3. “专业范式”的崛起

这一时期,新闻界从对新闻本质特征和基本写法的界定着手,建构“专业范式”的基本内涵。“多写新闻、多写真正的新闻、多写短新闻”一度成为当时新闻改革的重要口号。

一方面,厘清新闻文体的本质特征。80年代,新闻界开展了一系列诸如“新闻与宣传”“新闻散文化”“新闻与文学”“新闻五要素”“新闻思维”“新闻与信息”等学术讨论,不仅对当时新闻文体的变

^①解放军报社:《让“新、短、实”的新闻插上“鸡毛”》,见《中国新闻年鉴1985》,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88—89页。

^②樊云芳、丁炳昌:《新闻文体大趋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78页。

^③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人民日报70年·报告文学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003页。

^④钱钢:《〈唐山大地震〉和那个十年》,《财经》2009年第15期。

^⑤周胜林:《“海派”文体——大特写》,《新闻战线》1995年第4期。

^⑥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六卷》,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555—558页。

^⑦任稚厚、张雷:《新新闻体写作》,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革产生了重要作用,也从根本上厘清了新闻文体的基本特性。1983年,社会出现“信息热”,信息观念成为理解新闻文体形成与发展的“一把钥匙”,“新闻作品的根本功能和职责是传递新闻信息”遂成为新闻界的共识。^①1984年,新闻界开展了关于新闻信息量的讨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讨论还从新闻的结构、写法与篇幅等文体维度探讨了信息量问题——“新闻作品的信息量不仅包括在文字排列的句法结构中,而且也是由这种富有启示性的结构引起的联想唤起的,这些都不能离开新闻的结构、布局、词汇、语句的新颖和独创。”^②

由此,新闻文体“专业范式”中的“信息模式”得以型构,客观性原则逐渐成为记者文体实践的基本准则。80年代中后期,西方新闻学中“客观报道”的理念与技法逐渐被我国新闻界所接受,为了与传统宣传类报道加以区别,同时也是为了与“客观主义”划清界限,新闻界提出的一种“策略性概念”——“中性新闻(报道)”,其核心内涵与客观报道几无区别。

另一方面,深度报道的勃兴成为专业范式崛起的标志。1980年代,“改革”和“启蒙”成为时代的命题,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等一大批主流报纸的记者们率先从“报告文学”中汲取灵感,开始基于新闻文体的特质来探寻新的呈现方式。“作者抓住众所关心的时代主题,以独到的见解、广博的知识、细密的分析,给予读者某种启示和教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深度’。”^③

1985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发表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报道”作品——《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由此他逐渐意识到读者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读者不仅需要信息传播者提供的可‘读’的新闻,更需要经过信息传播者‘解读’的新闻。”^④此后,《第五代》《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鲁布革冲击》《关广梅现象》等成为历史名篇。1986年,深度报道被纳入“全国好新闻评选”范畴,1987年被称为“深度报道年”。这一时期的深度报道作品充满了忧患与思辨,强调将新闻事实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阐释,强调“理论化”——“它针对社会上和人们思想中的‘热点’和‘难点’,在展开新闻事实的过程中,以严密的逻辑,深刻的思辨,丰富的材料,从理论的高度对事实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理性化的解释,使人感到其中的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⑤但是,这种“政论式”、“思想式”的报道模式,其问题也显而易见。梁衡先生的评价最为中肯:“这种通讯是一历史、二哲学、三文学、四才轮到新闻。……新闻是信息传播,要求直说,不能太长,不许绕圈子。所以这种所谓的气魄、力度是借机自我表现。”^⑥

信息模式、客观性原则和深度报道建构了80年代“专业范式”的基本内涵,广大新闻工作者由此建立起“职业意识”与“专业精神”。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大多数活跃在新闻工作第一线的新闻界人士已经明确认识到,“新闻工作的首要职能是沟通信息”(占68.1%),他们坚定否定了“任何新闻报道都应起到宣传鼓动作用”的“金科玉律”(占64.4%)。这是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认识的正确复归,这种认识的复归将为改造现象的宣传化了的报道模式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⑦

总体看,1977—1989年,三大范式已经呈现出并行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1989年,全国好新闻明确将“三统一”作为“好新闻”必备的品格,亦即“形式、内容、风格的和谐统一;事实、价值、效果的

①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新闻界》1998年第2期。

②时统宇:《关于增强新闻信息量的讨论综述》,见《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5—76页。

③李庄:《李庄文集·散文论文编》,第12页。

④张建伟:《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下),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361页。

⑤任稚犀、张雷:《新新闻体写作》,第11页。

⑥梁衡:《新闻绿叶的脉络——一个评委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⑦喻国明:《我国新闻工作者新闻观念更新的现状及其分析——对全国新闻界关于新闻改革问题抽样调查的研究分析报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学研究1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9页。

和谐统一；新闻价值、宣传价值、审美价值的和谐统一。”^①这显示出新闻报道的国家标准也在意图统合三种范式。

（四）1990—1999年：“范式”的定型与融合

按照文体学的观点，“文类演变的一条基本途径就是各种文类之间的交叉、渗透、综合、汇通。”^②从1990年开始，不同新闻文体范式逐渐“定型”，并越来越呈现出互相借鉴、彼此融通的态势。

这一时期，“宣传范式”明确提出并巩固了“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1994年，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首次提出“舆论导向”的概念。此后，“正面宣传”与“舆论导向”密切结合，成为“宣传范式”的方针和目标。1990年，中国记协首次设立“现场短新闻”评奖活动，1991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首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活动，其评选标准都集中体现了“宣传范式”和“专业范式”的融合。

1991年前后，报业兴起“周末版”大潮，喻国明先生认为它标志着中国传媒的传播模式由“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型。^③作为一种结果，“大特写”作为“文学范式”与“专业范式”共同观照下的新闻文体形态再次得到巨大发展。1995年，中国青年报创办“冰点”，关注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强调写实与人文情怀的有机结合，“记者以一个普通人所具有的同情心，基本使用‘白描’手段，客观、真切、栩栩如生地描述出采访对象的苦难和希望，极大地唤起了善良人群的共鸣。”^④于是，《北京最后的粪桶》《五叔五婶》《导师母亲》等代表作迅速引起社会关注。

90年代中后期以后，晚报、都市报的相继崛起带来了“市民体”新闻的出现。“市民体”强调‘以市民为本’，要求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具有亲和力，平易近人。内容特征是市井化、全息化、纵深化、人情化。形式上平民化、趣味化、通俗化、事实化。^⑤从某种意义上说，“市民体”体现了三种范式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市民体”的载体晚报、都市报是党报体系的一部分，自然要遵循“宣传范式”的基本要求。同时，“市民体”的理论支点是“读者需要论”，满足读者的信息需要，恰恰是“专业范式”的逻辑起点——“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遵守新闻宣传纪律的前提下，提出要‘急市民之所急，想市民之所想，市民需要什么，我们就报道什么’。”^⑥另一方面，“市民体”必须“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了提升新闻的可读性，故事化、文学化的操作模式成为这些报纸的基本选择。“采用对话、描写、场景设置等，生动展现新闻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借助新闻事件中的戏剧性因素来突出主题。”^⑦

1996年，《南方周末》开始使用调查性报道作为其“对中国发言”的重要新闻品种。同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开播，“中国式电视调查性文体”成为这个栏目标志性特征。1998年，刚刚创刊的《财经》也选择调查性报道“监测”社会。名记者卢跃刚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到“90年代后期崛起的《南方周末》和《新闻调查》与80年代中后期《中国青年报》相比，其新闻实践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时，卢跃刚回答简洁有力：“从专业角度来看，他们还是在恪守专业原则。”^⑧与此同时，客观性原则也逐渐成为新闻界具有共识性的报道观念。1997年，我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的新闻工作者认同“保持事实准确”、“报道要客观”、“抢时效”、“挖掘更深入”是“极为重要”的操作追求。^⑨这即是说，

①何光先：《十年新闻写作变革》，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②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第67页。

③喻国明：《传媒变革力——传媒转型的行动路线图》，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④李大同：《冰点故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⑤童兵、陈绚：《新闻传播学大辞典》，第40页。

⑥吴定勇：《都市报崛起之谜》，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

⑦童兵、陈绚：《新闻传播学大辞典》，第43页。

⑧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第41页。

⑨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在90年代的十年中,从客观性原则(文体观念)到调查性报道(文体形态),“专业范式”在两个层面上完成了“定型”。

(五) 2000至今:“范式”的转型与重构

进入新世纪以后,各种自媒体、平台媒介等层出不穷,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文体范式也随之改变。

首先,“宣传范式”的内涵在不断强化,形式呈现多样化。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新华社连续推出七篇特稿,集中报道七位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背景、经历和家庭生活。这组题材重大的特稿,一改传统写法,强调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写法上打破了传统领导人新闻的“禁忌”,从交代的领导人各自成长经历中暗含了他们的施政理念,释放了很多明确的政改信号,同时还披露了领导人许多平常而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展示了他们的亲民形象,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公开了过去被视为国家机密的领导人家庭成员等敏感信息,写法上完全跳脱过去官样文章的窠臼,笔触充满了人文情怀。

在具体的文体实践中,“宣传范式”与其他两种范式互动的频率也日益增多。一方面,“用事实说话”的方式更加具专业性。例如——

蛟龙深潜突破7000米

本报北京6月24日电(记者余建斌)北京时间6月24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区域,成功下潜至7020米深度,在这个世界最深海沟写下了目前中国载人深潜的最深纪录。

北京时间6月24日4时30分,“蛟龙”号7000米海上试验队举行出征仪式,5时29分潜水器开始注水下潜,8时50分许,“蛟龙”号突破7000米深度,下潜深度7005米。9时15分,“蛟龙”号坐底深度稳定在7020米,开展了相关海底作业。

(《人民日报》2012年6月25日第1版)

这篇报道属于“成就报道”范畴,记者在报道中没有任何评论或抒情,而是通过数据、事实的展示,来揭示重大主题。导语部分最后一句话,运用比喻修辞,形象地呈现了“新闻眼”。主体部分按时序式结构展开,交代了关键性节点的具体数据,最后一句话“于无声处听惊雷”,“稳定”在海底最深处“开展相关海底作业”,彰显了中国在载人潜水器领域的巨大技术能力。

另一方面,强调专业地运用“故事模式”来实现宣传目的。例如获得2005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报道《3.5万救命钱留给病友》(长沙晚报2005年8月24日)。这篇报道主旨是为了弘扬社会正气,宣传中华传统美德。记者没有采用传统的“政论模式”,抑或在报道中加入观点,而是运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了两位癌症病友互助抗癌,最终一位放弃治疗救助另一位的故事。故事末尾以放弃治疗救助别人的病友挂断电话做结,独具匠心且意味深长。整篇报道用文学化的笔触凸显生动的感染力,用故事化的方式传递正能量,凸显了“宣传范式”融合“文学范式”后的最佳传播效果。

其次,“专业范式”更加强调客观与深度。2000年前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开始被中国新闻业广泛接受。加之,我国社会开始从简单的情绪宣泄转向需要利益协调、理性建设的层面,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以一种更成熟更负责任的态度观照现实、记录时代。以《南方周末》为例,它在这期间的报道,更注重现实关怀,更注重挖掘事物深层次的发展逻辑,强调“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拓展,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和理想思考,使一大批读者的观念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启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做出了一个负责任媒体的应有贡献。”^①基于此,新闻文体“专业范式”继续在客观性规范与深度化追求两个维

^①杨兴锋:《南方报业之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度进行探索。再如,《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广东专家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病毒引起的可能性极大》(《南方日报》2003年2月19日)这篇报道的最大特色就是运用专业的笔法来展现理性和建设性。导语开门见山,呈现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观点,从而突出“新闻眼”。主体被两个判断句式的小标题切分为两个部分,给予两派观点的篇幅大体相当:对于北京专家的观点,记者援引新华社报道,篇幅281个字,内容涉及判断依据和治疗方案。对于广州专家的观点,记者通过采访,篇幅324个字,内容也涉及判断依据和治疗方案。结尾秉持科学态度,强调确定病毒的难度与时间长度,但不影响对症治疗。由此,这篇报道一举斩获当年的“中国新闻奖”和“广东新闻奖”两个“一等奖”,其报道者也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二等功”,这是当年给予非医务人员的最高奖。

最后,“文学范式”不再以具体的文体样式出现,更多地融入其他范式之中,强调文学笔法的介入与人文情怀的展现。2011年7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该报记者赵涵漠采写的《永不抵达的列车》。这篇特稿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为背景,报道了两位在事故中逝去的大学生们的故事。这篇特稿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记者也没有过度地煽情,更没有大量地使用感情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副词,只是在用平缓的笔触进行平实的叙述,生活中最为寻常的点滴细节在记者的笔下被一一呈现,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那种平凡的感动,恰恰最容易接近读者的心灵。这里,显示的正是“专业范式”与“文学范式”的合力。

(责任编辑:程天君)

China's News Style in the 70 Years Since 1949: Symbiosis and Integration of Paradigms

LIU Yong

Abstract: News style refers to the structure and discourse style of news report. The evolution of news style is determined by the logic of journalists' news practice and the change of mentality in journalism. News stylistic paradigm is the generalization of different stylistic norms governing "how to write". Rising above the specific news texts, the paradigm determines the stylistic concepts behind stylistic forms and techniques. Combining the internal rationale and external form of news text, the history of news style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1949 has been shaped by the interaction among journalism,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or culture). It also conforms to the self-consistency of the inherent logic of news style. In fact, the three styles of "publicity paradigm", "literature paradigm" and "professional paradigm"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On this basis, they interweave with one another,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bsorb and transform one another. The three stylistic paradigms do not emerge along the time course, nor are they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the same thing. On the contrary, they sometimes coexist in the same stage, sometimes in the same media, and sometimes even in the same news text.

Key words: news style; publicity paradigm; literature paradigm; professional paradigm

About the author: LIU Yong, PhD in Journalism,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